

华梅 等 著

人类服饰 文化学 拓展研究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下册

华梅 等 著

人类服饰文化学拓展研究 下册

人民日报出版社

他学科的研究人员也没什么两样。但不管是残破还是精美的古代遗物，对它们的研究都是为了重现已经不存在的古代社会（包括物质和精神方面）。而且，考古学理论既烦琐又矛盾，田野考古通常也是辛苦异常。尽管如此，考古学仍是一门非常与众不同的学科：它具有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激动人心和神秘莫测的特质。古埃及图坦卡蒙陵墓和中国兵马俑给全世界所带来的震撼与激动，就很少有其他学科能够相比。正像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所强调的，考古学的价值在于它能给人们带来快乐。

那么到底什么是考古学呢？“考古学”（archaeology）一词是17世纪法国里昂的一位医生兼古物学家雅克·斯蓬根据希腊文 *arkhaiologia* 重新创造出来的，词根 *arche* 在希腊文中有开端之意。从字面解释，考古学就是对起源的探索。不过，要给它下个准确且全世界都适用的定义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考古学在发展过程中，研究的对象、任务和目的都在发生变化，特别是一些国家基于本国的国情和学术传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考古学体系，有各自不同的学术定位。例如，欧洲的考古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独立学科；中国把考古学看作对历史的补证，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在北美，考古学则是人类学的子学科。因此，中国和西方在考古学概念上的表述都不尽相同。

1994年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对考古学的定义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①。中国的一本考古学教材中关于考古学定义除了以上内容外，还加上了“它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② 这样一句话。西方普遍认可的是戴维·克拉克所下的定义：“考古学是这样一门学科，它的理论和实践是要从残缺不全的材料中，用间接方法去发现无法观察到的人类行为。”^③ 加拿大考古学家特里格进一步说明道：“尽管考古学被赋予种种不同的目的，但是大部分考古学家仍然认为考古学是研究过去人类行为和文化发展的学科。”^④ 他指出，无论是考古记录还是物质遗存，如果不与人类行为相联系就根本无法了解它们。这也是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② 陈淳编著：《考古学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③ [美]戴维·克拉克：“考古纯洁性的丧失”，《古物学》，1973年第47期。

④ [加]布鲁斯·G. 特里格著，陈淳译：《考古学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考古学唯一可以与其他学科相沟通的方面。不过，无论中西方在概念表述和学术定位上有什么差异，都会认同考古学的这样一个宗旨：它力求了解人类过去的生活状况，力图探索考古现象产生的原因，并解释社会文化发展的规律。

（二）西方考古学的研究历程

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是始于19世纪中叶，历史背景是欧洲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社会正处于由启蒙运动所带来的在文化和科学上的昌明与进步时期，具体则是在欧洲近代古物学、生物学与地质学共同推动下产生的。纵观西方考古学的发生、发展的全部过程，可以按照阶段的不同，将它分为萌芽期、形成期、成熟期、发展期和革新发展期。

1. 萌芽期（1760—1840）

喜欢探寻过去和收藏古物似乎是人类的两大天性。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对人类起源问题十分感兴趣，“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考察过希腊周边的文明及野蛮民族，并已认识到埃及文明有着更古老的历史。对古物的好奇与热情，最早可追溯到一位公元前6世纪的巴比伦国王那波尼德。他主持了对一座神庙的考古发掘，结果挖到了一块比当时还要早上数千年的基石，这位爱好考古的国王也就成了已知最早的“考古学家”。

15世纪，发轫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使欧洲人重新认识到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光荣与伟大。由罗马教皇和意大利贵族率先带动起的对希腊罗马时代的雕像、石刻等古代艺术品的收藏热，席卷全欧洲。不久，欧洲人又对基督教圣地巴勒斯坦地区的古迹和古物发生兴趣，后来这种兴趣还扩大到对近东地区的埃及、巴比伦等地的更为古老的古迹和古物的寻访和搜集。在此背景下，古物学开始兴起，但早期古物学所关注的仅限于文物的艺术价值。16世纪英国建立了正规的古物学，把对艺术品的热情转向对整个艺术史的研究上。这一转变使古物学向科学的道



图8-1 约翰·温克尔曼画像

路迈进。18 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古物学大力提倡科学探索精神，古物学家开始为地下出土的文物提供详细的描述与记录，进而探索文物的年代。古物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为近代考古学的产生打下了坚实基础。1764 年法国学者约翰·温克尔曼撰写了著名的《古代艺术史》，首次从历史角度研究古代艺术。温克尔曼根据艺术风格对希腊和罗马的雕塑进行分期，并探讨艺术风格演变因素。这种研究方法对后来的考古学影响极大，他也因此被西方尊为考古学之父。（见图 8-1）

古物学的兴起和发展也促进了较为严肃的田野考古的出现，古物学家开始研究古物本身和古物的文化因素。英国的古物学家们活跃在自己国家的各个地方，斯堪的纳维亚的古物学家则忙碌于北欧沿海边，寻找和记录存于地上的古代遗物，推测它们的成因和用途。例如，英国第一位田野考古学家约翰·奥布里对威尔士巨石阵和艾夫伯里石柱群的详细报道和用途猜测，以及丹麦古物学家对海边贝冢的研究。当然，此时古物学的研究还有着宣扬本国古代历史，以增进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豪感的动机与任务。法国人则把田野考古工作放到了埃及。1798 年拿破仑远征埃及，远征军中有为数不少的科学家、绘图员和美术家。他们对埃及做了详细的调查，包括埃及的地理、动植物、风土人情和古代建筑，并在开罗建立了埃及研究院。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没有进行考古发掘，而是竭尽所能把能搬得动的埃及艺术品都收集起来，准备运往法国，其中就有考古学史上非常重要的发现——罗塞达碑。但由于法国人被英国海军击败，所有的艺术品最终被送进了大英博物馆而不是罗浮宫。不过，拿破仑的入侵却促成了埃及学的建立和发展，1809 年多卷本的《埃及的描述》出版，1822 年法国语言学家弗朗索瓦·商博良根据罗塞达碑上由希腊文、埃及象形文字和埃及通俗体文三种文字组成的铭文，经过二十年的不懈努力，最终破译出埃及象形文字。（见图 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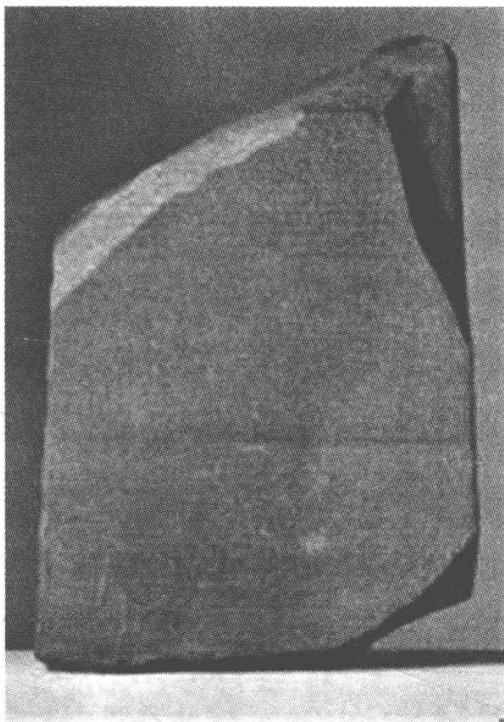


图 8-2 罗塞达碑

从 16 世纪的下半叶开始，欧洲人对中

东地区古物探险工作也有了很大进展，他们搜索并记录下当地属于亚述、巴比伦、波斯的古代遗址，并对刻有古代楔形文字的各种铭文产生了浓厚兴趣。以研究中东两河流域古代文明为主的亚述学也确立起来。1786年法国主教约瑟夫·博安考察了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些废墟，并于1786年试掘了巴比伦。这是已知对近东古代遗址的首次发掘。

欧洲古物学经典研究到18世纪陷入困境。经典研究主要依赖于文字记载和口头传说，但当面对日益增多的无文字记载的古物时便束手无措了。埃及学和亚述学通过考古发掘而不是已有的文献进行年代学研究的方法，使学者们逐渐意识到考古发掘是获得人类历史信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和途径。考古学脱胎于古物学的时机已经到来，但仍缺少几个必要条件。考古学诞生的条件，除了年代更久的考古发现，还需要有系统的指导理论和严谨的科学方法。这三个条件用丹尼尔的话来说，便是英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地质学的发展以及生物进化论的确立。

2. 形成期（1840—1870）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说过人有分类的本能。无论是古物学还是考古学，确定古物日期并分门别类都是首要的任务。但考古学的分类方法是一种科学的独立于文献的断代方法，这是与古物学最根本的区别。1800年至1850年史前考古学率先在丹麦等斯堪的维亚国家出现。其一，是因为丹麦人最先开始了古物学的思想革命，把古物学家的艺术爱好转变为考古学家的历史研究。其二，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丹麦人汤姆森在1819年提出了著名的“三期论”。他认为，史前时代的丹麦经历了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三个时期。不久他的学生沃尔塞（1821—1885年）又进而把“三期论”用于野外古迹的分期，并以发掘工作中所见的地层关系作为证明。1843年，沃尔塞发表了《丹麦原始时代古物》一书，使“三期论”从此成为史前考古学的研究基础。

由于英、法两国有着斯堪的维亚所没有的丰富的旧石器遗存，旧石器时代的研究便首先从英国和法国开始了。受基督教上帝创世说的影响，欧洲人长期以来相信人类是由上帝在公元前4004年创造出来的。早在17世纪末，伦敦格雷客栈路下就发现了打制石器与绝灭动物共存的现象，开始引发人们对人类古老性的思考。1834年比利时的施梅林博士根据他在比利时恩基洞穴

中人骨与灭绝动物共存现象的发现，发表了研究成果，确信它们“是在同一时间，由于同一原因被掩埋在一起的。”英国神父麦克内里从1825年开始，在英国的肯特洞穴中发掘了四年，发现了与犀牛等绝灭动物遗骸共存的燧石工具，也认为人类起源肯定早于公元前4004年。19世纪中叶，达尔文（1809—1882年）在《物种起源》提出了进化论。赖尔（1797—1875年）在其划时代的《地质学原理》中提出了均变论。均变论和进化论学说使人们懂得人类的出现至少在数十万年之前，并认识到人类是从猿类演化而来的。1856年发现的尼安德特人的头骨化石，不久也被引用为进化论的物证，彻底否定了上帝于公元前4004年造人的神话。

1838年法国彼尔特在索姆河畔首先发现旧石器，并认定是原始人类所用的工具。1865年英国的卢伯克（1834—1913年）使用希腊语的词根，创造了“旧石器”（Palaeolithic）和“新石器”（Neolithic）两个名词，以表示两个石器时代的存在。法国考古学家艾夫伯里在1865年发表的《史前时代》中将石器时代进一步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后来，拉尔泰（1801—1871年）又用古脊椎动物化石作标准，把旧石器时代分为三期。尽管拉尔泰的分期是从古生物学角度借用的方法，但他首创了在考古学上采用非考古资料来进行分期的方法。

1853—1854年在瑞士境内发现了“湖居”遗址，有着许多保存良好的遗迹和遗物。湖居遗址在史前考古学的意义在于证明了三期论的正确性，同时使考古学家认识到观察地层的重要性。另外，湖居遗址保存了大量有机质的遗物的发现，为人们了解人类远古生活提供了较为详细的信息，考古学家不再只把一些难以损毁的器物如石器、青铜、铁器、陶器等当成有价值的考古证据，那些容易腐烂的有机物也可能保留下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历史信息。

由于史前时代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对史前史的研究必须完全依靠考古学，因此史前考古学的发展又推动了整个考古学的发展。史前史研究以进化论的理论为指导，按照近代自然科学的传统，以严格的科学方法从事研究，使作为科学的近代考古学从此得以成立。1867年在瑞士召开了第一次“人类学和史前考古学国际会议”。这使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在国际学术界得到了普遍的承认。

1850年到1900年之间，欧洲各国在近东的田野考古进展迅速。不过，这

一时期的大部分田野考古学家更像是盗墓贼，不讲求科学方法，盗墓式的野蛮发掘和劫掠成了这时期田野考古的一大特色。例如，意大利人贝尔佐尼（1778—1823年）在埃及为掠夺珍宝而进行的令人发指的滥掘古墓行为。到了1859年，法国马里埃特担任埃及政府的古物局局长，才对这种盗掘加以控制。

1835年英国人罗林森（1810—1895）释读出贝希斯顿三体铭文中的一种楔形文字为古波斯文。1842年，法国人博塔开始发掘古代亚述的尼尼微城址。次年，他又在豪尔萨巴德发现了亚述王朝萨尔贡二世的宫殿遗址，获得了大批石刻浮雕和楔形文字的铭刻。1845—1851年英国人莱亚德也在尼姆鲁德和尼尼微发掘出亚述时代的许多石刻浮雕、楔形文字的石刻和泥板。他出版了《尼尼微古迹》和《尼尼微及其遗存》，影响很大。对尼尼微的挖掘也是以寻宝为主要目的，发掘方法上没有任何科学性可言。

从1863年起，意大利考古学家菲奥雷利改进了对庞培古城遗址的发掘方法。他以恢复这一古城的原貌为目标，对遗址中的房屋遗存按单元进行全面的揭露，讲求层位关系，并将发掘出来的遗迹保存在原地。在发掘中，贫民的居处和富人的邸宅同样受到重视；出土物不论精美与否，都被作为不容忽视的标本。他的这种审慎、周密的工作态度，为此后庞培城址的科学发掘打下了基础。

3. 成熟期（1870—1900）

西方考古学在1870年之后开始进入成熟期。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成为这一时期考古学研究的一个焦点。法国考古学家莫尔蒂耶反对拉尔泰旧石器时代的分期方法，他认为，史前史的分期必须依据考古材料本身，不能采用古生物学的方法。他借用地质学中划分年代的方法，用典型的器物来划时代，以典型遗址作为命名的依据，以此建立起文化发展和进化的序列。1869年到1872年，莫尔蒂耶把旧石器时代分为四个阶段：舍利期、莫斯特期、梭鲁特期、马格德林期。实际上，拉尔泰和莫尔蒂耶用“时代”和“分期”来编排人类史前史的方法都对考古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瑞典的蒙特柳斯继沃尔塞之后，大量使用比较考古学和类型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并将类型学的理论加以系统化。类型学是在三期论的基础上对考古发现进行编年并探讨它们在地理上的分布。从1885年到1895年，蒙特柳斯

把北欧的新石器时代分为4期，青铜时代分为5期。这时，早期铁器时代的哈尔施塔特期和拉登期2期被进一步确定下来。这样，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欧洲史前考古学的整个体系得到了确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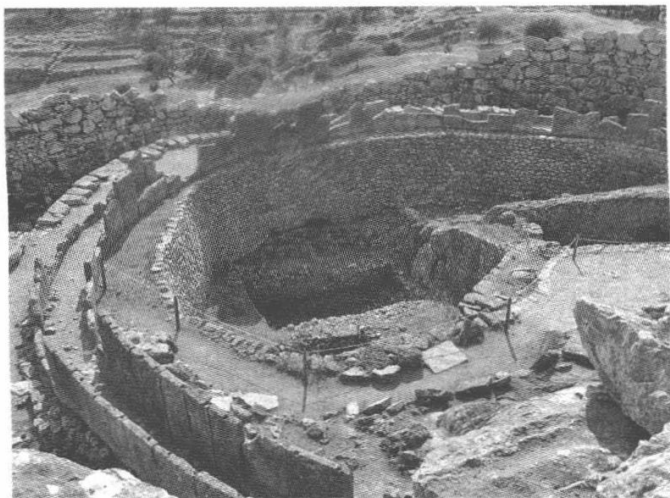


图8-3 迈锡尼遗址

19世纪末，比旧石器分期更为有意思的是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艺术的发现和爱琴海文明的发现。1879年著名的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被发现。洞顶的史前人类的动物图形彩绘，被莫尔蒂耶称为，“这是艺术的童年，而不是儿童的艺术”。1870年德国人谢里曼通过田野考古发现了早于荷马时期的迈锡尼文明，以及以

特洛伊二期为代表的先迈锡尼文明的安纳托利亚文明。他的发现证明了荷马史诗不是神话传说，而是真正的希腊历史。（见图8-3）

欧美的考古学者还到中美和南美各地进行调查发掘。第一次大规模的发掘，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在洪都拉斯的科潘地方的玛雅文明遗址进行的，1896年发表了正式的发掘报告。德国的乌勒，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直在秘鲁的帕查卡马克进行发掘，他的发掘报告于1903年出版。

科学的考古发掘是从这时期开始的。源于地质学的层位学正式应用到田野考古中。首先明确了发掘的目的不是为了挖宝，而是要把地下的古迹和古物揭露出来，了解它们原来的位置、布局和后来的变化，这样就可以使由于时间的推移而被灰烬和泥土掩埋起来的人类历史得到重视。19世纪后期，德国和奥地利的考古学家在希腊和意大利发展了考古发掘的技术。在庞培古城遗址，意大利的考古学家进一步发展菲奥雷利的发掘方法。谢里曼除了在发掘中采集全部遗物并注意地层关系以外，他还要求充分做好包括绘图、照相在内的各种记录，迅速整理资料，及时发表报告。英国的皮特里在埃及的发掘工作中，更讲求发掘方法的科学化，他于1904年写出《考古学的目的和方法》一书，总结了自己的工作经验。在英国，皮特里的前辈皮特-里弗斯则被视为科学考古发掘的创始者，早在1880年至1900年，他便已用上述的

科学方法在英国克兰伯恩蔡斯地区发掘居住址和古墓。这样，考古学也就被承认是利用实物的证据以探索古代人类历史的一门科学了。

4. 发展期（1900—1950）

在20世纪刚刚到来之际，考古学史上的最著名的发现之一——英国的阿瑟·伊文思对希腊传说中的克诺索斯迷宫的发掘，就轰动了整个西方。考古学再次成为公众眼中最让人着迷的学科。而此时，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已深入人心，人类起源说已不再有神学的痕迹，欧洲和近东的史前史也建立了科学的研究框架，中美洲的玛雅和南美的印加文化也逐渐展露于世人面前。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地层学和类型学作为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操作原则，也被大多数的考古学家理解和接受，考古学正式成为西方大学的主要课程之一。

第一次大战曾一度中断了考古学的研究工作，但战后欧洲的考古学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重新恢复并有更大的进步。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苏联考古学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从事研究，使苏联考古学的面貌为之一新。英国的柴尔德，在一定程度上也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美国的摩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中提出了按照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阶段划分的另一种“三期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这一划分方法为恩格斯所赞许，并被苏联考古学界以及柴尔德等西欧的考古学家所采用。但汤姆森的“三期论”仍然有它一定的作用，所以并没有被国际学术界所抛弃。柴尔德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了《欧洲文明的黎明》《史前时代的多瑙河流域》和《远古时代的东方》等著作，运用考古学“文化”代替了“时期”；从前的所谓“阿舍利时期”“莫斯特时期”之类，这时都改称“阿舍利文化”和“莫斯特文化”等。这主要是因为考古学的“文化”有地域上的局限性，一种“文化”不能代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时期，各种不同的“文化”往往在同一个时期中并存，实际上是各自代表具有同样文化传统的共同体。明确了考古学“文化”这一基本概念之后，考古学研究就必须有更多的资料和对资料更为精细的分析，而研究的结果就能更符合于客观的实际。

在田野考古学方面，1926年，英国的考古学家惠勒首次采用方形探方对古代遗址进行发掘，即考古学上有名的“惠勒的方格”，这种方法在大面积揭

露的同时，又能比较科学地控制和记录发掘的层次，很快便为考古学家们接受并应用到考古实践中。惠勒还首次提出了“透物见人”的观点，主张考古学家应掘出古代的“人民”，而不仅仅是掘出古代的文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种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都有快速的发展，它们在考古学上的应用比前一时期更为广泛和普遍。例如，在勘察方面，利用空中摄影技术探索地面上的遗迹，利用“地抗力”的测定法以探测埋藏于地下的遗迹。在分析、鉴定方面，则应用地质学、物理学和化学的方法判别岩石、矿物和金属制品的质地和成分，应用体质人类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的方法以鉴别人骨的性质，兽骨的种类和农作物的品种等。结合考古发掘，进行古代土壤和其中所含孢子花粉的分析以了解古代的植被面貌，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20 世纪的 20—30 年代是西方考古学的黄金时代，有许多举世瞩目的大发现。1923 年英国 H·卡特在埃及发掘图坦哈蒙墓，1924 年英国马歇尔发现了印度的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文明。1926 年英国吴雷在伊拉克境内的乌尔发掘苏美尔王陵。30 年代以来，达特和布鲁姆在南非，利基在东非发现了南方古猿的化石，它们可能是直立人的直系祖先，与之共存的据说有打制的砾石工具，以后称为奥杜韦文化。因此，有人认为东非也许是人类最初的摇篮。

美洲的考古工作也获进一步开展。秘鲁的特略发现了查文遗址，发掘工作证明查文文化是秘鲁最早的文明，年代约从公元前 900 年到公元前 200 年。美国学者在美国境内，主要是研究史前时代的印第安文化，研究方法的特点在于考古发掘与民族志调查（调查现存的印第安人部落）相结合。1926 年，在新墨西哥州的福尔瑟姆发现美洲当时所知的最早石器，年代约在前 9000 年至前 8000 年，说明早在中石器时代，北美洲已有人类居住，他们可能是末次冰期以后从亚洲的东北部迁移过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使考古学像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开始思考文化的本质问题，而不是只关注年代和分类。1943 年，美国的泰勒发表了《考古学之研究》，对传统考古学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对陷于烦琐的器物排队和以年代序列为目标的考古学研究提出了严厉的质疑，主张考古学在年代学和历史问题之外，还应当着重研究古代遗存的社会文化功能，通过系统的“缀合式研究”，全面揭示古代社会的文化面貌。

5. 革新发展期（1950—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快速发展，在考古学上的应用也更为广泛，更为重要。例如，电磁测定法用于探寻遗迹，放射性碳素测定法、钾氩法、热释光测定法、古地磁测定法等用于测定遗迹和遗物的年代，X射线荧光分析法、电子探针法、中子活化法等用于分析遗物的成分等，使考古学研究得到很大的进展。用电子计算机储存并分析各种考古资料，也是这一时期才开始的。尤其是放射性碳素断代的广泛应用，使考古学家能确知各种史前文化的绝对年代，从而就它们之间的年代先后序列做出确切可靠的结论，这可以说是史前考古学上的一次革命。过去，欧洲的考古学家们认为，欧洲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文化的绝对年代较晚，是受到近东地区文化的影响才发展起来的，经过放射性碳素断代，知道它们其实并不晚，很可能是独自形成的。这使柴尔德在他的遗著《欧洲社会的史前史》一书中也改变了以前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此外，由于航空技术和摄影技术的提高，特别是人造卫星上天之后，航空摄影发展为航天摄影，使前一时期创立的航空考古学又有了显著的进展。潜水设备的改进，则使水下考古学在这一时期得到正式的成立。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这段时间里，考古学除了因科学技术而有面貌一新的变化外，考古学也比以前更加重视理论的研究。理论建设成为当代考古学最重要的研究内容。受泰勒理论的影响，60年代，美国的宾福德对考古学作了全新的阐释，以他为代表的过程主义考古学建立起来。过程主义考古学主张考古学就是人类学，应该研究探求“文化动力学”的规律，将人类文化遗存分为物质文化产品、社会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产品等三方面，提倡科学缜密的发掘和分析方法以及透物见人的考古学中程理论的建设，首先根据考古遗存研究复原人类的行为特征，然后进一步揭示文化中不同部分相互作用和发展的规律性。这种全新的思潮也被称为新考古学。

新考古学过分贬低历史学，将考古学等同于人类学的研究方式从它建立一开始就受到考古学界的质疑。到20世纪70年代时，新考古学从考古材料中提取信息能力不足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从80年代时起，以英国的伊恩·霍德为代表的考古学家在批判过程主义考古学的基础上，采用哲学思想来构建新的考古学研究理论体系。建立了诸如结构主义考古学、马克思主义考古

学、认知考古学、女性主义考古学等流派。这些流派被统称为后过程主义考古学。

考古学家越来越关注考古解释的科学性、公正性和伦理性，对考古学史的研究空前兴盛。今天，技术和观念等的进步已逐渐使全世界的考古学家从繁重的年代学和人类历史的时空框架的研究中解放出来，开始将主要的精力集中在考古学学科体系与理论方法的探索及人类起源、食物生产的起源和文明与复杂社会的起源及其对文化进步的具体影响这样几个对认识人类文化演进过程中的几个关键性的转变环节，因此对它们的全面认识几乎涉及考古学的全部认识成果。如今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许多至关重要的线索，提出了一些极具说服力的假说。例如，最引人关注的是，1987年美国科学家凯恩等人运用基因分析技术，通过分析线粒DNA（从母方获得的遗传物质）发现：世界上所有现代人都是—位生活在约20万年前到15万年前的非洲妇女的后代。这一观点也被称为“夏娃的假说”。目前就人类只有一个起源（非洲）还是有多个起源的争论仍在继续。可以预期，对三大起源问题及其在文化史上的经验教训的研究，仍然是21世纪考古学的首要课题。

（三）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

形成于20世纪初的中国考古学，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不懈努力和辛勤探索，已由一株幼苗成长为学术之林的一棵参天大树，成为世界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考古学大致经历了萌芽期、形成期、成熟期、繁荣发展期四个发展过程。

1. 萌芽期（1900—1920）

中国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就有学者对古代遗迹和遗物进行考察与研究。到距今1000年的北宋时期产生了具有一定学术系统的“金石学”。到清代时，金石学已相当发达。就像西方的古物学之与近代考古学—样，中国的金石学也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虽然金石学家也会到田野中访寻古代碑版石刻，但更主要的工作仍是研究历史典籍，因此直到西方近代田野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前，金石学都未能也不可能发展成考古学。

西方近代考古学诞生半个世纪后，开始为中国学者所注意。1900年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中介绍西洋史学思想时提及，“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

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①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更讲到19世纪中叶以来欧洲考古学家将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3期，并将中国古史传说与此比附。正当此时，1898年安阳小屯村再次发现有字甲骨，引起了王懿荣、刘鹗等金石学家的注意。1900年敦煌石窟又发现储存大量古代写本文书和其他文物的藏经洞。近代学术史上的这两项惊人发现，成了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前兆。

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把目光投向了这个世界唯一尚存的文明古国，时值晚清末年，中国无力保护自己的古代遗迹。一些国家纷纷派遣考察队潜入中国边疆，以考古研究为名，大肆掠夺珍贵文物，他们以非科学方法进行调查发掘，致使许多古代遗迹遭到破坏，造成中国文化遗产的极大损失。但这些发现也使中国人认识到田野考古的重要意义。从1920年起，北洋政府开始主动聘请外国学者和国外学术团体进行联合考古工作。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法国生物学家德日进先后来到中国。1921年安特生发现了北京周口店人类化石地点。同年，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以彩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并进行首次发掘，提出仰韶文化的命名。接着，他又在甘肃和青海地区进行了大范围的考古调查。1926年从美国学习人类学归来的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发掘，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

2. 形成期（1920—1950）

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了考古学研究室，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内设考古学组。这一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首派董作宾前往安阳小屯进行调查和发掘，这是中国学术机构独立进行的首次科学发掘，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之一。1929年，李济作为当时中国唯一具有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学者，被聘任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同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及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分别成立。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从事考古研究的学术机构。

1929年在裴文中的主持下，发现第一个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随后，发

^① 章太炎著：《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1页。

现大批石制品和人类用火痕迹，使北京人的文化遗存得到确认。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 1928—1937 年间对殷墟进行了 15 次发掘，梁思永等在安阳后岗首次从地层上判定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这是中国史前考古研究科学化重要标志。1930—1931 年间，由李济、梁思永主持发掘山东城子崖遗址，著《城子崖》，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大型田野考古报告。一些地方博物馆也开展了田野考古工作，如杭州西湖博物馆 1933—1936 年发现余杭良渚遗址，华西大学博物馆 1932 年发掘广汉月亮湾遗址等。中外合作的考察也有 1928 年以前开始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及邻近地区的活动，持续进行到 1933 年。中国学者黄文弼在吐鲁番附近调查发掘高昌古城、交河古城遗址及高昌墓地和汉代烽燧遗址。袁复礼在吉木萨尔附近，勘察并实测唐北庭都护府遗址。在抗日战争期间，迁往内地的中国考古机构在条件很困难的情况下，采取合作的方式进行田野调查和发掘，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例如，云南大理古代遗址、四川彭州市汉代崖墓、成都前蜀王建墓的发掘等。

20 世纪的 30—40 年代，中国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已经走上初步发展的轨道，摸索出一套适合中国考古特点的田野考古方法，积累了一批通过正规发掘获得的科学资料，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 成熟期（1950—1970）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考古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50 年代初，分别中断了 12 年周口店遗址以及 13 年的殷墟发掘都得到了恢复。著名的武官村大墓就是在这时得到清理的。1950 年在原北平研究院史学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基础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考古学进入成熟发展期的一个重要标志。从 1952 年起，连续 4 年由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对各地文物单位参加考古工作的 300 多名人员进行了短期业务培训。同时，又在北京大学创办了考古专业，培养考古专门人才。在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实践中，各地的考古队伍日益健全起来。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当地文物保护工作，承担调查发掘工作。而在此时，田野考古的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50 年代和 60 年代前期，工作量较大的田野考古工作集中在黄河流域的一些地方，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的调查发掘为数并不太多。开始几年，为配合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往往由中央或行政大区的文物考古部门直接领导，调集各方面的人力协同进行调查发掘。后来，各地逐渐开展较多的田野工作，对遗址进行普查和试掘，清理不同历史时期的大量墓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黄河、长江流域的部分省级文物单位，则对史前时期的半坡遗址、北首岭遗址、庙底沟遗址、大汶口墓地、屈家岭遗址、北阴阳营遗址，商周时期的二里头遗址、郑州商代遗址、丰镐遗址、洛阳东周城、侯马晋城，以及汉唐两京城址、元大都遗址和明定陵等其他重要遗址，分别进行规模较大的发掘。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大面积揭露的遗址尚不甚多，各地田野工作的发展很不平衡。

4. 繁荣发展期（1970— ）

“文革”之初，同中国大部分学科的命运一样，考古学的研究工作基本停顿下来。1968年在河北保定满城的一次军事施工中，意外发现了一座保存完整的汉代墓葬——满城汉墓。即使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时代，满城汉墓及其随葬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艺术价值仍让人感受到考古学的独特魅力。1974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和秦兵马俑的发现轰动世界，使中国政府意识到考古发现是宣传国家文化成就的一个重要窗口，文物考古研究因此受到政府的空前重视。于是，在这场浩劫的中后期迎来了中国考古学的繁荣期。《文物》《考古》和《考古学报》三大专业杂志同时复刊，各学术机构纷纷恢复中断了的田野考古工作，这是繁荣期开始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中国考古学繁荣期，除了马王堆和秦兵马俑外，还取得了像姜寨遗址、大地湾遗址、王因遗址、陶寺遗址、柳湾墓地、关庙山遗址、河姆渡遗址、草鞋山遗址、石峡遗址等重要成果。田野考古随着繁荣期的开始，在工作范围上很快扩展到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少规模很大的发掘工地。其中比较重要的发掘项目有：登封王城岗城堡、淮阳平粮台城堡、二里头宫殿遗址、偃师尸乡沟商城、黄陂盘龙城遗址、三星堆遗址、周原遗址、纪南城遗址、曲阜鲁城遗址、凤翔秦国宗庙遗址、居延烽燧遗址，法门寺地宫以及汉唐两京的某些遗址。又发掘许多结构复杂，埋葬丰富的大型墓葬，如随州曾侯乙墓、平山中山王墓、广州南越王墓等，连工作量最薄弱的西南边疆和北方沙漠草原地带，也都发掘过史前遗址，如西藏昌都的卡若遗址就揭露了数十座房基。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宣告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考古事业进入持续繁荣发展时期的一个

重要标志。(见图8-4)

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田野考古更加完善,达到较高的科学水平。早在50年代初期,在辉县琉璃阁的发掘工作中,第一次成功地剔剥出一座完整的车马坑,曾被西方考古学家誉为考古发掘方法的新的进步。多年来,中国的细致考古发掘,一直得到国际考古学界的广泛好评。在清理许多大型墓葬的过程中,妥善地处理了糟朽不堪的漆木器、丝织品、帛书、帛画,使之较好地保存下来;对于散乱的玉衣、铠甲、简牍,在清理过程中,特



图8-4 汉代青铜长信宫灯

别注意各个零件的位置和相互关系,仔细观察和做好记录,以复原它们的整体。考古发掘还扩大到古代的矿场、铸铜和冶炼作坊、烧制砖瓦和陶瓷器的窑址,以及造船工场、沉船、桥梁等。这些情况说明,中国的田野考古已经真正成为科学化的学术研究工作。

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的也被考古学广泛采用,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65年年底建成中国第一个放射性碳素断代实验室,1972年开始公布年代数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已成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必要手段。这便为建立各种文化类型的年代序列,提供了更加可靠的科学根据。在探寻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进行夏文化的探索和先商、先周文化的研究方面,放射性碳素断代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其他断代、分析、鉴定技术,如热释光断代、古地磁断代、钾-氩法断代、骨化石含氟量断代、铀系断代法、X射线荧光分析、中子活化分析、电子探针显微分析、X射线衍射分析、穆斯堡尔谱分析、同位素质谱分析等,都已陆续在中国考古学中应用。尤其是对金属品、陶瓷器、玻璃器和纺织品,进行较多的分析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另外,通过对孢粉的分析考察古代的自然环境,鉴定作物标本的品种,动物骨骼的种属,探讨中国农业和家畜的起源,也有相当的进展。更重要的是,以考古研究为中心的多学科协作已